心理科学进展　2018, Vol. 26, No. 12, 2249–225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8.02249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

吕小康[1]　武　迪[1]　隋晓阳[1]　汪新建[1]　程婕婷[2]

([1]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350)
([2]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社会工作系，威海 264209)

摘　要　伴随着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质疑以及决策心理学领域的证据积累，公共政策研究愈加关注现实状态中的民众心理与行为规律。此类行为科学化的公共政策研究与实践注重以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心理学指标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利用相应的心理效应与技术以提升公共管理质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借鉴英国的行为洞察团队、美国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等实体机构的运作经验，进一步明晰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内涵，组建实体智库、并立足中国国情展开针对性研究，是推进今后我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及其实践的可行方向。

关键词　理性人；行为人；行为科学；行为公共政策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长期从事行为决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又译理查德·泰勒)因在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引发了学界和大众对行为经济学和决策心理学的热议。塞勒一直以来都提倡将心理学知识应用于公共政策，各国政府也不断实践着这方面的观点。2010年英国政府成立专门的助推机构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BIT)，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和新加坡也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于2015年成立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SBST)，各国政府的助推机构在推动养老金储蓄政策的实施、提高美国大学入学率、节约能源和提高疫苗注射率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果(Benartzi et al., 2017; Thaler, 2015)。这些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明显以采纳或借鉴心理学等行为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主要特点。

从已有学术界定上看，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所制定的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使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解决某一问题及其有关事物而展开这些活动(Anderson, 2003)。它通常是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某一公共问题而推出，以调解社会冲突、平衡各方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目的(Bennett & Vedder, 2015; Lee, 2012; Schmitt & Schulze, 2011; Shi, Tsai, & Kao, 2009)，从而改变、保持或者创造有益于人类福祉的生活环境(Shafir, 2013)。它包含“做什么”与“不做什么” (决策)、“怎么做” (执行)、“做得如何” (评估)等多个相互连贯的动态过程(戴伊, 2004；豪利特，拉米什, 2006)。当前，公共政策的内涵界定无论是对全社会的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伊斯顿，1993)，还是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陈庆云，2011)，普遍选择客观物质作为体现价值与利益的载体，加之，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教育、福利、医疗卫生、环境、交通等核心问题，离不开经济成本与治理效益的权衡，导致公共政策领域对经济理论具有高度依赖性。

收稿日期：2017-11-13
*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QA170901)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8DSHJ03)资助。
通信作者：程婕婷, E-mail: chengjieting@126.com

不仅如此，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以公共政策为自变量，分析或测度政策结果，是该领域广义上的主要研究类别之一，通过引入大量的经济学概念，帮助决策者更好的设计和选择政策(薛澜，林泽梁，2013)。另外，从既有政策评估的重点看，其核心评估方式考察表征各种物质利益的宏观经济社会指标是否有所提升，如将收入增长、失业率下降、发病率降低等作为公共利益提升的操作化标准，却很少考虑政策满意度、利益获得感、主观幸福感等主观化的指标。但是，随着行为科学被逐渐引入经济学研究，个体与群体的行为规律可以矫正经济模型解释社会现实与预测社会发展之间的偏差，令行为因素同样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亟待验证与引入的关注点之一。

事实上，为了保证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公共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始终离不开对该政策适用范围内的各群体和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规律的准确把握。但是长期以来，公共政策作为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注重从宏观视角(国家或组织)探讨公共政策的必要性、合法性和执行效率，依据理论研究所提出的现象阐释和解决对策，难以进行实践的检验与运用(郑肯，勉闻光，2016)，即使研究者能够注意到心理状态与规律的影响，却受制于宏观层面的方法所限，无法合理探讨民众欢迎或抵触某一公共政策的心理机制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问题。其实，心理学在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和实践技术上均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有本质上的契合(杨玉芳，郭永玉，2017)，加之，社会治理的主体是人，并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事务作为治理对象，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群体决策的心理活动(辛自强，2018)。只是，心理学自身对公共政策研究的参与度较低，对如何应用心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杨玉芳，郭永玉，2017)，但随着 Kahneman 和 Tversky 以及 Thaler 等人以决策过程为联结点，将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具体化为中微观的个体与群体行为规律，解决了行为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方法与技术方面的主要障碍。

显然，所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广义的治理过程，都无法脱离具体的人和他们构成的群体。一旦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偏离了人类自身的心理诉求和文化传统，无论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如何完美，都很难取得成功(斯科特，2017)。因此，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注重引入心理学等行为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技术是必要之举。尤其是侧重政策结果的研究，本身便具有实践导向，即在实践中检验政策效果，更是需要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规律及其数据信息，以完成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许多西方的公共政策研究者和心理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展了诸多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从而逐渐发展出“行为公共政策研究”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 study)这一全新的交叉学科领域。虽然目前行为公共政策研究还较少作为一个专业术语而被人重视，但已经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和心理学等领域分散性地积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的实践性尝试。总结西方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可为结合中国国情开展类似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2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

2.1 从行为经济学到行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产生与当代社会科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 (rational man)假设的批评密切相关。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是理性人的典型决策形式，但未经深思熟虑与不符合常理的个体决策行为屡见不鲜，个体对最优选择和决策环境存在理解差异，这动摇了“理性人”假设的根基(Hodgson, 2012)。实际上，“理性人”假设并非承认人是“理性人”，而旨在为讨论人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起点(张翔，2015)。只是，为避免经济学研究者陷入人性争论而设置的假设前提，反倒成为制约经济理论解释实际问题的根本性障碍。

对此，经济学领域逐渐出现“行为人” (behavioral man)替代“理性人”的探索，研究者普遍关注能力和动机的综合作用，既探讨个体是否拥有实现某类最优决策的能力，又侧重亲社会性、公正、声誉等社会性动机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莫志宏，申良平，2014)。从 Simon (1955, 1982, 1986)论证个体基本心理过程是制约理性最大化决策的因素，到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针对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行为提出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逐渐开启学者探讨描述方式(Tversky & Kahneman, 1981)、情绪(Bell, 1982; Loomes & Sugden, 1982)、偏好(Beshears, Choi, Laibson, & Madrian, 2008; Congdon,

Kling, & Mullainathan, 2009; Golman, Hagmann, & Loewenstein, 2017)、时间感知(Loewenstein, 1988; 刘扬, 孙彦, 2014)等各种行为本身及影响行为的因素对个体决策的作用, 呈现心理学探究个体决策机制的专业性。

前文提到, 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对经济理论存在高度依赖性, 所以, “行为人”假设对经济学领域的影响, 同样延伸至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事实上, 社会生活普遍包含各类经济现象, 许多经济学者本是利用各种社会事实检验“行为人”假设, 却同时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引入行为因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了依据, 为公共政策研究实现行为科学转向奠定了研究基础。比如, 消费者行为难以被正统经济模型所预测(Thaler, 1980), 还有储蓄选择、教育发展、法律约束、成瘾物质控制、公共物品获取、薪酬变动、健康保障等围绕经济问题的现象(Diamond & Vartiainen, 2007), 既是行为经济学进行应用研究的主要对象, 也是社会治理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心理学领域并非从未予以关注, 甚至早已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环境、政策概念、政策研究方法展开了研究, 只是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 始终难以被其他学科以及社会公共领域所接受(Task Force on Psychology &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n, Board of Social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1986)。

行为公共经济学(Behavioral Public Economics)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受“行为人”假设影响的重要方面, 得以解决政府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行为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困境(朱国玮, 左阿琼, 2010)。比如, 政府干预成瘾行为、制定禁毒政策、监禁等治理方式, 可根据神经科学领域对成瘾行为的脑机制研究, 通过了解成瘾者的行为实现降低成本、提升政策实用性的效果(Eagleman, Correro, & Singh, 2010)。还有社会福利、储蓄行为、公共品供给、集体决策时的投票行为、财政领域的政策选择行为, 均需要大量的公共政策分析, 只是“理性人”假设无法解释这些公共品供给的自愿情形以及公共领域合作等问题(周业安, 王一子, 2017)。所以, 公共政策研究、经济学、行为公共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从凸显经济特征的社会公共领域着手, 以社会治安、健康保健、医疗保险、税收为核心研究内容, 着重从丰富政策的实施方案、改进政策的预测过程、创新福利的内涵解读等方面, 更新对人类经济行为规律的归纳与预测, 以实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改变(Chetty, 2015)。与此同时, 这一趋势扩展至公共管理研究领域, 自 1996 年至 2015 年期间, 该领域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涉及心理学内容的论文发表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Grimmelikhuijsen, Jilke, Olsen, & Tummers, 2017)。

综上所述, 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 理性模型本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De Neufville, 1983; Alexander, 1984)。但是, 行为经济学以及行为公共经济学的出现, 动摇了“理性人”假设的根基, 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模型基础。21 世纪伊始, Madrian 和 Shea (2001)、Thaler 和 Benartzi (2004)提出改善养老储蓄的行为经济学策略, Thaler 和 Sunstein (2008)提出政府应以“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 (libertarian paternalism)助推个体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和行为, 逐渐开启了行为科学推动公共政策发展的序幕。随后, 以 Congdon、Thaler、Madrian 等人及其团队为主要研究者(Benartzi et al., 2017; Congdon & Shankar, 2015; Madrian, 2014; Thaler, 2015; Mullainathan, Schwartzstein, & Congdon, 2012), 将公共政策研究推向了行为领域的新方向。塞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更标志着主流经济学和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与期待,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有望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所极力主张并实践着利用个体认知规律而引导其行为发生微妙变化的助推策略, 已被验证有利于某些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现状的改善(Thaler, 2015), 为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证据。

公共政策研究的行为科学转向, 也离不开判断与决策心理学家的参与。判断与决策学会前主席 Jonathan Baron 将决策理论按照性质分为了三种类型: 规范性模型(normative model)、描述性模型(descriptive model)和指导性模型(prescriptive model) (巴伦, 2009)。李纾(2016)将这三种决策理论类型分别对应三种社会制度或经济体制。规范性理论是关于什么思维可以最佳地实现思考者的目标的理论, 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 描述性理论是关于人们通常如何思考的理论, 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指导性理论是“指导”或陈述我们应当如何思考的简单模型,

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指导性的市场经济。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于规范性模型与描述性模型研究的基础上，面向实际应用的指导性模型。

遗憾的是，虽然零星见于报刊短文或口头交流中，至今仍未有学者特别明确将“行为公共政策”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并将之作为一个细分的研究领域加以推进。因此本文中所提到的“行为公共政策”，应理解为“涉及人们行为规律与特征的公共政策”，而“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则是“具有行为科学特征的公共政策研究”，暂取一种宽泛松散的含义加以理解。但是，公共政策模型从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的转变，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蒋励佳，2012; 赵俊男，2014)。

2.2 中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态势

与国外学界的情况类似，我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也较为分散，但也已逐步体现出明显的以心理学知识与技术服务于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的责任担当，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自觉意识。相比于行为科学所涉及的其他学科，心理学已经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先行军。近些年来，我国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和突发性社会危机事件不断出现，环境治理、贫困治理、社会心态治理等领域也方兴未艾，在客观上为心理学家投身于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机遇和实践场所。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过程与心理应对、对公共政策的公平性认知与满意度考评等心理学内容，并以此提出改善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建议。

例如，我国 2002 年底至 2003 年春爆发的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传染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促进了对疫情信息的风险评价的研究和社会心理预警指标的建设(时勘等, 2003); 2008 年 5 月四川汶川突发 8.0 级地震，研究者发现越接近震中的个体，心理反而越平静，由此发现并命名了“心理台风眼”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即在时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平静(Li et al., 2009; Li et al., 2010; 李纾等, 2009); 类似 SARS 传染病和汶川地震等危机，促进了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谢晓非，郑蕊，2003; 梁哲等，2008); 对颇有争议的二甲苯化工(PX)项目的环境危害性感知导致的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以及污染型产业的选址与地域转移问题，促进了学界对环境领域的邻避效应的研究(陈昌容，周林意，2017; 王娟，刘细良，黄胜波，2014; 王佃利，王玉龙，于棋，2017; 张婧飞，2015)和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SLO)的研究(王建，黄煦，崔周全，栗欣，胡克, 2016; Zhang et al., 2015)，以及对出台环境公共政策前的民意调研与分析的相关研究(刘立波，2015; 唐啸，胡鞍钢，杭承政，2016; 林丽梅，刘振滨，杜焱强，苏时鹏，郑逸芳，2017; 王丽丽，张晓杰，2016);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通过对城市、城镇及农村居民的住地依恋研究，促进研究者发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位错效应” (town dislocation effect)，启示在城镇化进程的评估中，要综合使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注重加强城镇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李纾，刘欢，郑蕊, 2017)。

又如，当下空气污染的严峻形势，促使学界关注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与政府和企业形成治污权力的相关议题(吕小康，王丛，2017; 张君，孙岩，陈丹琳，2017); 中国政府对反贫困和社会公正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催生了“心理扶贫”策略、即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研究贫困群体的生理、认知、情绪等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扶贫策略的研究(艾娟，2017; 曹艳春，2017; 陈坚，2017; 杭承政，胡鞍钢，2017; 吕小康，汪新建，付晓婷，2014; 王昶，王三秀，2016; 吴胜涛，张建新，2007; 徐富明等，2017); 关于社会心态及其治理对策的研究也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充分重视，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吕小康，2017; 吕小康，朱振达，2016; 吕小康，张慧娟, 2017; 王俊秀, 2014a, 2014b, 2016, 2017; 周晓虹，2014)和系列调研结果(王俊秀，杨宜音，2013，2014，2015; 王俊秀，陈满琪，2016)，并正积极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建议，而且展示出一定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心理学理论范式的潜质。同时，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不断从交叉视角的角度重视风险认知与沟通、舆情传播与民意建构、专家话语与受众接受度的相关研究(汪新建，张慧娟，武迪，吕小康，2017; 王丽萍, 2017; 徐蓉, 2009)，使得公共政策的行为科学视角有了充分的跨学科传播基础。

所有这些研究，无一不是受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重大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阶层的分化

与流动、城镇化推进与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国际化接轨与本土化创新等宏观社会背景驱动，有着鲜明的应用研究导向和政策输出的公共知识诉求，引进了一系列西方行为科学成果和技术，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心理学效应。但相对而言，还欠缺成熟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形成实体化的政府智库或公共政策导向型的学术研究团体，因此要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应用心理学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整合和实践探索。

3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题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主旨主要包括如何更有效的达到政策目标、如何更有效地评估政策效果等方面，同时也关注公共政策的社会正义特性。

3.1　控制政策设计与执行的成本

成本是众多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时所必须考虑的指标。利用个体或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可以降低公共政策的投入成本，或者增加政策的经济收益，从而提升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应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成本”并不仅仅是狭义的经济成本，还涉及认知成本。这一主题在行为经济学的系列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英国的行为洞察团队旨在提升公共服务的经济性和便利性，通过提供适用于特定政策的人类行为模型以促进服务效果的产生，并使群众能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决定(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2017)，分析行为科学在具体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包括避免儿童救助申请的重复频率和盲目增加救助规模情形的出现(Service et al., 2014)，为家长、老师、学校领导提供教育行为引导(O’Reilly, Chande, Groot, Sanders, & Soon, 2017)，邮寄信件即可影响年轻人的大学申请行为(Sanders, Chande, & Selley, 2017)等。美国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SBST, 2015)主要关注各类政府服务项目在降低运营成本时的行为规律，着重从行为科学视角解读群众面对政策时的决定和反应，强调服务于群众的各类项目只有容易接触、理解和使用，才能令群众认识到其中的益处(White House, 2015)，重点考虑政府决策和个体行为影响政策执行效率，在保证项目按规章执行的同时，依据行为规律节约实施成本，甄别出政府更易提升执行效率的项目。

另外，有研究利用框架效应，用惩罚降低高收入比奖励表彰更能激发教师用心提升学生表现的动机(Jr Fryer, Levitt, List, & Sadoff, 2012)；有研究利用默认效应(default effect)减轻决策者的心理负担，提供潜在保证的暗示，仅通过更改默认选项这一简单操作，将直接影响机构的捐款政策、消费者的决策、退休计划的制定(Dinner, Johnson, Goldstein, & Liu, 2011; Madrian, 2014)、促进穷人的储蓄行为(Bertrand, Mullainathan, & Shafir, 2004)，通过简化选项、降低认知成本，可以达到增加参与度的目的，简化选择项亦能促进个体参与健康计划的决策(Gennetian & Shafir, 2015; Bhargava, Loewenstein, & Sydnor, 2017)。而提升政策的经济收益的研究则多与经济、财政、税收政策有关。比如，有研究发现更改缴税规范的通知信件无法改变提升纳税行为，但包含社会规范和公共产品等信息的通知邮件却可以(Hallsworth, List, Metcalfe, & Vlaev, 2017)；简化支付链接网址可提升医疗保险的在线还款率(SBST, 2015)等。

3.2　提升政策效果中的社会效益

当然，也有些公共政策研究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而在于提升社会效益。同时，经济利益的投入与产出也不是公共政策研究所关注与评估的唯一可操作性指标和方式。这方面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同样有用武之地。美国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为促进人们参与退休保障金计划、提升大学入学率、增加工人就业和小型企业创收的机会、推动人们完成健康保险的投保过程等直接改善人们参与项目的状态，探索行为规律以促进社会效益的政策设计与实施方案。比如，通过对比呈现清洁与非清洁能源的选项提升消费者对可再生资源的选择率，以简化温室气体的年度报表形式增强社会大众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均增强了相应政策的影响力(SBST, 2016)。英国的行为洞察团队试图分析降低卡路里摄入的政策实施与人们体重增加之间的矛盾现象(Harper & Hallsworth, 2016)。

还有，一些研究利用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效应，把某家庭收到的水电煤气等能源消耗量与其邻居的相关信息进行对比，可降低能源耗用量(Allcott, 2011)；为司机提供与其身份相似或驾驶高级轿车者的交通行为，可以有效减少司机的交通违反行为(Chen, Lu, & Zhang, 2017)；向家庭提供

简要的大学申请信息和帮助，可提升其子女的大学入学率(Bettinger, Long, Oreopoulos, & Sanbonmatsu, 2012)；政府透明度可以提升低知识水平被试对政府的信任度，但高知识水平被试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却不受其透明度的影响(Grimmelikhuijsen & Meijer, 2014)，这说明对政府的信任既与政策的内容有关，也与受众群体的特质有关，如何以及何时推出相关政策，需要更为精准的考量；医疗服务的框架效应会显著影响被试的满意度(Olsen, 2015)，这提醒政府或组织在描述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时应谨慎使用相应的叙述框架。

3.3 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此外，公共政策是对抗社会不公、提升社会正义的重要工具。在推出这些政策时，若正确地利用心理学知识，有助于降低偏见、歧视、污名、刻板印象，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如果说前面的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认知心理学的策略，这一部分的公共政策研究则更多依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改善群体接触状态和丰富信息获取途径，是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为提升社会公正感所普遍采取的干预措施。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强调偏见源自个体对社会环境的特定认知，并非无知、仇恨等个体意识或情感所致，从而并不注重改变个体认知以影响偏见现象的干预路径，而是从个体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总结偏见影响个人社会判断和行为的规律，期望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以避免偏见侵害社会利益与破坏社会公平。例如，Graham 和 Lowery (2004)发现警察若接触与黑人有关的刻板印象词汇，将明显增强对青少年盗窃或者暴力行为的有罪认定；增加医患之间的接触时间和要求医务人员增加跨文化教育培训，可以帮助各类病患获得平等的治疗待遇(Shelton, Richeson, & Dovido, 2013)；不同种族的大学生随机住在同一寝室，可明显改变成员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Shook & Fazio, 2008; Van Laar, Levin, Sinclair, & Sidanius, 2005)；向学生讲解刻板印象威胁现象的原理，可有效缓解这种偏见效应(Johns, Schmader, & Martens, 2005)等等。当然，面对偏见与歧视等现象的复杂性，心理学等行为科学尚处于探索其本质的研究阶段，诸多心理与行为层面的干预策略普遍处于干预效果和生态效度有待提升的境地(杨廙，胡金生，2013)，即使提出向偏见者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性意见、学校和社区采取干预措施、利用大众媒体的宣传功能、提升政治觉悟和意识等不同层面的改善措施(Guerin，2005)，也是成效微弱且效能的持久性较差，因此这一方面的规律仍有待总结和提升。

4 总结与展望

行为科学视角下公共政策研究之所以能够获得流行，与其所使用的方法密不可分。行为科学擅长开展实验研究，将各类公共政策现象以及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用被试的实际表现及其变化证实具体的行为规律，体现科学的精细化、控制化的特征，恰好满足当前社会治理更加注重细节和人性化效果(陆志孟，于立平，2014)的需要。传统实验室研究的外部推广效度一直广受批评，为此，行为科学也常采用现场实验(field study)的方式加以弥补。纵览行为经济学以及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普遍以实验室研究结论为前提，再运用实地研究验证真实环境中的表现，缩减实验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差距，从而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实证支撑。在积累起精细化和确定性经验证据后，行为科学研究者就有了更充分的信心去质疑传统“理性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并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

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受到欢迎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其与生俱来的跨学科性。公共政策研究本身涉及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同时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信息安全等领域又同具体的化工、医药、网络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学科密不可分。心理学犹如一个催化剂，在不同学科、不同背景之间起到粘合助推的作用。一旦某种心理学技术能够顺利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或评估，就很容易在该政策涉及的多学科、多领域造成广泛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向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推广心理学知识的最佳途径之一。

虽然行为科学研究已经涉猎各类公共政策研究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研究态势，但也暴露了研究主题过于分散、研究内容缺乏整合、研究结果存在矛盾、研究结论难以推广等问题。本质上讲，这正是人类行为的多样化导致行为规律的总结与运用可能随时面临无法解释的现实情境。其实，早在 2005 年，多学科领域的行为科学家在

分析行为科学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时，曾提出三个有待解决的问题：(1)明确具体的研究分支和领域；(2)确定政策研究的可行性方向；(3)探索使研究结果有效影响政策制定者的途径(Amir et al., 2005)。这三点仍是目前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所需面对和解决的。同时，鉴于国内类似研究积淀较浅、实体机构较少且国内的公共管理实践有别于西方社会等现实，我国的相关研究还需要特别注意立足中国国情而开展。为此，本文拟从学术和实践层面提出如下三点应对思路。

第一，进一步明确“行为公共政策”及“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学术内涵，提供一个有着相对清晰但又具有一定包容性的界定，成为能够为主流学界认可的学术术语和学科领域。由于公共政策研究涉及的领域众多，不同领域涉及的专业知识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具体的研究导向而言，仍宜根据各个国家与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具体的社会需求，以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针对不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选取短期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深度积累相关的政策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逐渐积累公共政策研究视角下的行为规律现象，再确定长期的研究目标和研究价值，同时提炼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框架和实践体系，支持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从“理性人”到“行为人”的根本性转向。同时，行为公共政策研究不仅需要从事大量有别于传统政策研究的工作，还要主动阐明研究结果与政策内涵的关系，以减轻政策制定者的理解负担，为公共权力部门采纳政策建议创造更为轻松的认知氛围，从而增加自身结果为他人采纳的可能性。

第二，组建不同领域的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实体性智库，拓展行为科学家的参政建言渠道。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特色，专家话语首先需要在专业群体中获得共鸣，才能形成强有力的传播效应。目前，国内带有明显心理学等行为科学特色的智库尚不多见，尤其涉及心理学领域时，心理学家更多地作为团队一员而非主导者参与智库建设与建言行为。这与传统心理学更加重视实验室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导向有关。为更有效地进行知识输出与社会服务，心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全过程，培养一批既有坚实学术基础、又有政府实践经验的高端政策人才，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更为重要的智力支持，从而也为行为科学争取更多的行政资源与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第三，立足中国国情开展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公共政策的推出首先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方式。应该看到，西方行为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所有理论与实践，都离不开其所依存的政治体制与民主传统。不顾中国现实照搬其经验，本身就是最不符合“行为人”假设的行为。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治理问题，既有与国际经验相近的一面，也有突显自身特色、无法找到既有模板的一面。有些社会问题可能与西方历史发展中的类似进程较为接近，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网络技术风险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有些问题则明显带有中国社会的浓厚印记，比如医患关系问题、信访上诉问题、拆迁征地问题等。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行为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西方某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主张将其直接应用于中国实践，仍应考虑中国社会的实情与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加以改善和调整。但也正因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社会的转型为行为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其他国家难以遇见的实验场。在这实验场中锻炼塑造的行为技术，将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发展注入明显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当然这还有待于国内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艾娟. (2017). 为什么贫困会阻碍儿童的发展：基于心理学的解释. *江汉学术*, *36*(5), 123–128.

巴伦. (2009). *思维与决策* (李纾，梁竹苑　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曹艳春. (2017). 论社会保障制度中贫困群体的稀缺心态及其破解——基于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跨学科的分析视角. *浙江社会科学*, (5), 78–86.

陈昌容，周林意. (2017). 环境群体性事件中邻避事件：研究述评及展望.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8*(4), 86–93.

陈坚. (2017).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困境及对策——基于政策执行过程视角. *探索*, (4), 153–158.

陈庆云. (2011). *公共政策分析*.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戴伊. (2004). *理解公共政策* (彭勃，等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杭承政，胡鞍钢. (2017). “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4), 97–103.

豪利特，拉米什. (2006). *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 (庞诗，等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蒋励佳. (2012). 政策模型若干问题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202*(4), 119–123.

李纾. (2016). *决策心理: 齐当别之道*.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纾, 刘欢, 白新文, 任孝鹏, 郑蕊, 李金珍, … 汪祚军. (2009). 汶川“5.12”地震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科技导报, 27*(0903), 89–91.

李纾, 刘欢, 郑蕊. (2017). 城镇化过程中的城镇位错效应. *中国科学院院刊, 32*(2), 128–137.

梁哲, 许洁虹, 李纾, 孙彦, 刘长江, 叶先宝. (2008).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沟通难题——从心理学角度的观察. *自然灾害学报, 17*(2), 25–30.

林丽梅, 刘振滨, 杜焱强, 苏时鹏, 郑逸芳. (2017). 生猪规模养殖户污染防治行为的心理认知及环境规制影响效应.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6*(1), 156–166.

刘立波. (2015). 环境身份理论视角下的行动者环境行为研究. *生态经济, 31*(10), 170–173.

刘扬, 孙彦. (2014). 行为决策中框架效应研究新思路——从风险决策到跨期决策, 从言语框架到图形框架. *心理科学进展, 22*(8), 1205–1217.

陆志孟, 于立平. (2014, 5 月). 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目标导向与路径分析. *领导科学*, (13), 14–17.

吕小康. (2017). 怨气: 情感社会学的阐释. *社会科学*, (8), 79–84.

吕小康, 王丛. (2017). 空气污染对认知功能与心理健康的损害. *心理科学进展, 25*(1), 111–120.

吕小康, 汪新建, 付晓婷. (2014). 为什么贫困会削弱决策能力? 三种心理学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2*(11), 1823–1828.

吕小康, 张慧娟. (2017). 医患社会心态测量的路径、维度与指标.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6*(2), 105–111.

吕小康, 朱振达. (2016). 医患社会心态建设的社会心理学视角.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10–116.

莫志宏, 申良平. (2014). 从理性人到行为人: 评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正统理论的挑战. *南方经济*, (7), 73–87.

时勘, 陆佳芳, 范红霞, 贾建民, 宋照礼, 李文东, … 胡卫鹏. (2003). SARS 危机中 17 城市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预测模型. *科学通报, 48*(13), 1378–1383.

斯科特. (2017).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啸, 胡鞍钢, 杭承政. (2016). 二元激励路径下中国环境政策执行——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1*(3), 38–49.

汪新建, 张慧娟, 武迪, 吕小康. (2017). 文化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 文化认知理论的解释. *心理科学进展, 25*(8): 1251–1260.

王昶, 王三秀. (2016). 积极老龄化理念下老年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应对路径. *探索*, (2), 136–142.

王佃利, 王玉龙, 于棋. (2017). 从“邻避管控”到“邻避治理”: 中国邻避问题治理路径转型. *中国行政管理*, (5), 119–125.

王建, 黄煦, 崔周全, 栗欣, 胡克. (2016) 矿业领域社会许可的产生与意义. *中国矿业, 25*(6), 30–34.

王娟, 刘细良, 黄胜波. (2014). 中国式邻避运动: 特征、演进逻辑与形成机理.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6*(10), 182–186.

王俊秀. (2014a). 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 *社会学研究*, (1), 104–124.

王俊秀. (2014b). *社会心态理论: 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俊秀. (2016). 社会心态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分析. *江苏社会科学*, (1), 15–21.

王俊秀. (2017).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30 年: 回顾与展望.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4), 10–16.

王俊秀, 陈满琪. (2016).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6)*.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俊秀, 杨宜音. (2013).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2~2013)*.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俊秀, 杨宜音. (2014).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4)*.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俊秀, 杨宜音. (2015).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201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丽丽, 张晓杰. (2016). 公民环境信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规范激活理论. *中国环境管理, 8*(6), 81–85.

王丽萍. (2017). 认知民意: 政治学学科触角下的社会皮肤. *天津社会科学*, (2), 66–76.

吴胜涛, 张建新. (2007). 贫困与反贫困: 心理学的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5*(6), 987–992.

徐富明, 张慧, 马红宇, 邓颖, 史燕伟, 李欧. (2017). 贫困问题: 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5*(8), 1431–1440.

徐蓉. (2009). 群体性事件治理中的社会心理建设. *探索与争鸣, 1*(11), 53–55.

谢晓非, 郑蕊. (2003). 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 *心理科学进展, 11*(4), 375–381.

辛自强. (2018). 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 *心理科学进展, 26*(1), 1–13.

薛澜, 林泽梁. (2013). 公共政策过程的三种视角及其对中国政策研究的启示. *中国行政管理, 335*(5), 41–46.

杨廙, 胡金生. (2013). 内隐种族偏见的干预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2064–2072.

杨玉芳, 郭永玉. (2017). 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刊, 32*(2), 107–116.

伊斯顿. (1993). *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 (马清槐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婧飞. (2015).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2*(2), 35–40.

张君, 孙岩, 陈丹琳. (2017). 公众理解雾霾污染——海淀区居民对雾霾的感知调查. *科学学研究, 35*(4), 491–499.

张翔. (2015). “假设的真实性”: 科斯与弗里德曼的“和而不同”之处——兼谈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性人”假设. *社会学评论, 3*(6), 17–27.

赵俊男. (2014). 公共政策模型的比较与思考. *党政干部学刊,* (6), 71–74.

郑肯, 勉闻光. (2016). 中国医患关系的人类学解读. *医学与哲学, 37*(8), 60–62.

周晓虹. (2014). 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兼与《社会心态: 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一文商榷. *社会学研究,* (4), 1–23.

周业安, 王一子. (2017). 正在转型的公共经济学——基于行为公共经济学视角的讨论. *教学与研究, 51*(1), 73–81.

朱国玮, 左阿琼. (2010). 行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与进展. *经济学动态,* (5), 136–140.

Alexander, E. R. (1984). After rationality, What? A review of responses to paradigm breakdow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0*(1), 62–69.

Allcott, H. (2011).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misperceptions of energy cos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3), 98–104.

Amir, O., Ariely, D., Cooke, A., Dunning, D., Epley, N., Gneezy, U., … Silva, J. (2005). Psychology,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Letters, 16*(3-4), 443–454.

Anderson, J. E. (2003). *Public policymaking: An introd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ell, D. E. (1982). Regre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Operations Research, 30*(5), 961–981.

Benartzi, S., Beshears, J., Milkman, K. L., Sunstein, C. R., Thaler, R. H., Shankar, M., … Galing, S. (2017). Should governments invest more in nudg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8), 1041–1055

Bennett, D. L., & Vedder, R. K. (2015). Public policy, higher edu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we reached diminishing return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1*(2), 252–280.

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 Shafir, E. (2004). A behavioral–economics view of pov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2), 419–423.

Beshears, J., Choi, J. J., Laibson, D., & Madrian, B. C. (2008). How are preferences revealed.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8), 1787–1794.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2017). Who we are.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7, from http://www.behaviouralinsights.co.uk/about-us/.

Bettinger, E. P., Long, B. T., Oreopoulos, P., & Sanbonmatsu, L. (2012). The role of application assistance and information in college decisions: Results from the H&R Block FAFSA experi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1205–1242.

Bhargava, S., Loewenstein, G., & Sydnor, J. (2017). Choose to lose: Health plan choices from a menu with dominated optio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3), 1319–1372.

Chen, Y., Lu, F., & Zhang, J. (2017). Social comparisons, status and driving behavio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5*, 11–20.

Chetty, R. (2015).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5), 1–33.

Congdon, W. J. & Shankar, M. (2015). The white hous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Lessons learned from year one. *Behavioral Science & Policy, 1*(2), 77–86.

Congdon, W., Kling, J. R., & Mullainathan, S. (2009).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ax policy. *National Tax Journal, 62*(3), 375–386.

De Neufville, J. I. (1983).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Bridging the gap.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1), 35–45.

Diamond, P., & Vartiainen, H. (2007).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inner, I., Johnson, E. J., Goldstein, D. G., & Liu, K. (2011). Partitioning default effects: Why people choose not to choo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17*(4), 332–341.

Eagleman, D. M., Correro, M. A., & Singh, J. (2010). Why neuroscience matters for rational drug policy. *The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11*(1), 7–26.

Gennetian, L. A., & Shafir, E. (2015). The persistence of poverty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34*(4), 904–936.

Golman, R., Hagmann, D., & Loewenstein, G. (2017). Information avoid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5*(1), 96–135.

Graham, S., & Lowery, B. S. (2004). Priming unconscious racial stereotypes about adolescent offender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28*(5), 483–504.

Grimmelikhuijsen, S. G., & Meijer, A. J. (2014). Effects of transparency on the perceived trustworthiness of a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Evidence from an online experimen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4*(1), 137–157.

Grimmelikhuijsen, S., Jilke, S., Olsen, A. L., & Tummers, L. G. (2017).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bining insights fr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sycholog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7*(1), 45–56.

Guerin, B. (2005). Combating everyday racial discrimination without assuming racists or racism: New intervention ideas from a contextual analysis. *Behavior and Social Issues, 14*(1), 46–71.

Hallsworth, M., List, J. A., Metcalfe, R. D., & Vlaev, I. (2017). The behavioralist as tax collector: Using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s to enhance tax compli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48*, 14–31.

Harper, H., & Hallsworth, M. (2016). Counting calories: How under–reporting can explain the apparent fall in calorie intake.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Research Report*. Retrived December 27, 2017, from: http://www.behaviouralinsights.co.uk/publications/counting-calories-how-under-reporting-can-explain-the-apparent-fall-in-calorie-intake/.

Hodgson, G. M. (2012). On the limit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Economic Thought, 1*(1), 1–5.

Johns, M., Schmader, T., & Martens, A. (2005). Knowing is half the battle: Teaching stereotype threat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women's math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6*(3), 175–179.

Jr Fryer, R. G., Levitt, S. D., List, J., & Sadoff, S. (2012).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 (No. w1823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Lee, T. (2012). Race in America.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0*(3), 754–757.

Li, S., Rao, L. L., Bai, X. W., Zheng, R., Ren, X. P., Li, J. Z., ... Zhang, K. (2010). Progres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and variations sinc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5*(3), e9727.

Li, S., Rao, L-L., Ren, X-P., Bai, X-W., Zheng, R., Li, J-Z., ... Liu, H. (200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in the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PLoS One, 4*(3), e4964.

Loewenstein, G. F. (1988). Frames of mind in intertemporal choice. *Management Science, 34*(2), 139–262.

Loomes, G., & Sugden, R. (1982). Regret theory: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The Economic Journal, 92*(368), 805–824.

Madrian, B. C. (2014). Appling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policy design.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6*(1), 663–688.

Madrian, B. C., & Shea, D. F. (2001).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Inertia in 401(k) particip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4), 1149–1187.

Mullainathan, S., Schwartzstein, J., & Congdon, W. J. (2012). A reduced-form approach to behavioral public financ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4*, 511–540.

O'Reilly, F., Chande, R., Groot, B., Sanders, M., & Soon, Z. (2017). *Behavioural insights for education: A practical guide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London: Pearson.

Olsen, A. L. (2015). "Simon Said, " We didn't jum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5*(2), 325–326.

Sanders, M., Chande, R., & Selley, E. (2017). *Encouraging people into university.* 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 Research Report. Retrieved May 2, 2017,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encouraging-people-into-university.

SBST. (2015).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2015 Annual Report. Retrieved May 2, 2017, from https://sbst.gov/download/2015 SBST Annual Report.pdf.

SBST. (2016).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2016 Annual Report. Retrieved May 2, 2017, from https://sbst.gov/download/2016 SBST Annual Report.pdf.

Schmitt, S., & Schulze, K. (2011). Choos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n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of EU energy policy. In Tosun, Jale, and Israel Solorio (ed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Europe: Assessing a Complex Relationship?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Special Mini-Issue 1, Vol. 15, Article 9, http://eiop.or.at/eiop/texte/2011-009a.htm

Service, O., Hallsworth, M., Halpern, D., Algate, F., Gallagher, R., Nguyen, S., … Kirkman, E. (2014). EAST: Four simple ways to apply behavioural insights. *The Behavioural Insigths Team Report*. Retrieved May 2, 2017, from https://www.behaviouralinsights.co.uk/publications/east-four-simple-ways-to-apply-behavioural-insights/

Shafir, E. (2013).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elton, J. N., Richeson, J. A., & Dovidio, J. F. (2013). Biases in interracial interaction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In E. Shaifr (Ed.),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Public Policy* (pp.32–5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i, L. Y., Tsai, J., & Kao, S. (2009). Public health,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s, 29*(2), 43–59.

Shook, N. J., & Fazio, R. H. (2008). Roommate relationships: A comparison of interracial and same-race living situation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1*(4), 425–437.

Simon, H. A. (1955).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1), 99–118.

Simon, H. A.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s. 1 and 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imon, H. A. (1986).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59*(4), 209–224.

Task Force on Psychology &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n, Board of Social & Ethical Responsibility for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1986). Psychology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8), 914–921.

Thaler, R. H. (1980).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1), 39–60.

Thaler, R. H. (2015). *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Philadelphia: WW Norton & Company.

Thaler, R. H., & Benartzi, S. (2004). Save More Tomorrow™: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v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S164–S187.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Van Laar, C., Levin, S., Sinclair, S., & Sidanius, J. (2005). The effect of university roommate contact on ethnic attitudes and behavio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4), 329–345.

White House. (2015). *Fact sheet: President Obama signs executive order; White House anounces new steps to improve federal programs by leveraging research insights*. September 15, 2015,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7, from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9/15/fact-sheet-president-obama-signs-executive-order-white-house-announces

Zhang, A., Moffat, K., Lacey, J., Wang, J., González, R., Uribe, K., ... Dai, Y. (2015).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 of mining at the national sca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ustralia, China and Chil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08*, 1063–1072.

From *rational man* to *behavioral man*: The behavioral turn of public policy

LÜ Xiaokang[1]; WU Di[1]; SUI Xiaoyang[1]; WANG Xinjian[1]; CHENG Jieting[2]

([1]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riticism by behavioral economics on the rational man assumption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empirical evidences in the field of jud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ers increasingly paying closer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 of human being in real life. These studies tend to use psychological measures, such as satisfaction and trust indicators that embody public interests and subjective feelings,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policy. Besides, relevant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technologies are employed to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foster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udies of public policy in China should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two matured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Behavioral Insights Team in UK and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in US, clarify the connotations of this discipline, establish think tanks, and conduct researches based on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Key words: rational man; behavioral man; behavioral science; behavioral public policy